

性别与国家

晚清江浙地区女性公共化研究

张源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性别与国家

晚清江浙地区女性公共人化研究

张源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与国家:晚清江浙地区女性公共人化研究/张源远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61-2059-0

I. ①性… II. ①张… III. ①妇女解放—研究—江苏省—清后期
②妇女解放—研究—浙江省—清后期 IV. ①D4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2958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武云
特约编辑 段珩
责任校对 赵龙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66千字
定 价 4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绪言 / 1

第一章 | “公共领域”的两股新兴力量 / 10

第一节 传教士与晚清女性公共人化 / 11

第二节 公共知识分子与晚清女性的公共人化 / 34

第二章 | 区域社会公共秩序 / 59

第一节 官：政府统治下的女性公共人化秩序 / 59

第二节 绅：各派绅士对女性公共人化的不同作用 / 73

第三节 案例解析：官、绅、民所组成的江浙社会与女性公共人化 / 81



第三章 | 立足报刊的“公共表达” / 103

- 第一节 陈撷芬之女权思想 / 103
- 第二节 丁初我之女权思想 / 112
- 第三节 陈以益之女子教育思想 / 121
- 第四节 其他思想与论争 / 131

第四章 | 江浙女性“公共人”的勃兴 / 137

- 第一节 “演员”群体的迅速壮大 / 137
- 第二节 “观众”人数的急速增长 / 180

第五章 | 江浙女性公共人化的社会影响 / 194

- 第一节 女性公共人化与晚清江浙社会 / 194
- 第二节 女性公共人与晚清中国 / 205

结 语 / 221

附 录 / 228

参考文献 / 236

后 记 / 248

绪言

当今西方学术界对公共生活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学派，分别以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①和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为代表。近年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用于研究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由“经济利益和政治争论构成的”，“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②在公共领域所开展的政治批评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而美国学者桑内特则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将“公共领域”讨论的重点转移到“政治”以外。在他的学说里，“公共”是形象而具体的，“公共领域”不只是某种感情模式，同时还具备地理学上的意义，“它存在于它和另外一个领域——也就是私人领域——的关系中”。“此外，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它还涉及政治行为、人权观念、家庭的组织和国家的局限。”^③桑内特“公共领域”中的活动主体就是“公共人”（public man）。

在《公共人的衰落》问世以前，社会学界对公共生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而且其时“公共空间”是一个高度抽象的领域，缺乏历史的厚重和生动。然而，现代意义的公共空间最早是在西方城市出现的，倘若离开了城市

① 汉娜·阿伦特相信有一个纯粹的公告政治领域的存在，在这个领域中，无论属于哪种阶级、性别、种族或者民族，所有市民都能够平等对话。哈贝马斯将“公共”当成物质生活的产物，而汉娜·阿伦特则拒绝按照市民的物质环境来对他们进行定义。

② 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③ [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的生活、文化和地理的演变，单纯对公共空间进行分析，必然是有所缺憾的。桑内特所采取的研究途径则更加接近于人类学和历史学，试图以大城市为背景，来探讨人类的日常行为及社会交往。桑内特沿用了西方古老的“人间戏台（*theatrum mundi*）”观念，认为戏台与街道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从而对戏院中正式的表达模式和城市街头常见的表达模式进行比较。这在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中，被称为“戏剧学模式”，后亦被叫做“述行性”。该著主要研究了伦敦、巴黎、纽约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演变，由此赋予这种模式一个历史框架，通过研究人们和陌生人说话的方式、人们在街道上所穿的服装及室外空间和室内房间的对比，通过对日常行为和艺术领域中精心组织的表达进行比较，进而厘清这些具体行为的含义和它们的表达性。

按照人格在“公共领域”的表现及作用，桑内特将“公共人”分为两种：“少数人继续在公共场合主动地表达自己，延续了古代政治时期的想象，即认为凡人皆是演员。……另外一类公共人和前一类共生共长，这一类就是观众。观众参与公共生活的决心不如观察它的决心大，尽管他对自己的情感并不确定，但他并没有抛弃公共社会。”^①“演员”的表演始终是主动的，在某些情况下，“演员”充当规训者和“指挥家”，能够在公共场合激起“观众”的情感，让后者知道他们的生活是多么耻辱，多么需要改变；进而鞭策他们采取行动，改变他们的行为，最终征服后者，得到群起附和的效果。然而，“演员”并不总能起到主导的作用，有时候“观众”只是被动、沉默、专注地观察。此时，“观众”希望感知到更多的东西，需要在“演员”身上看到权威。另外，在公共场合，即使没有值得关注的人物，“沉默的观众”依然存在。

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跨文化应用，需要将其从特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审慎地创建出一般性的理论架构。桑内特的“公共领域”理论主要以18世纪以来的伦敦、巴黎和纽约为背景来研究日常行为及社会交往模式。咖啡屋^②、咖啡厅^③、酒吧、餐厅、俱乐部、供行人散步的公园以及戏院本身的前厅和附属建筑物，甚至街道等各种社交场所，都成为“公共领域”范围。而“公共人”则是

① [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页。

② 咖啡屋：Coffeehouse，只出售咖啡。

③ 咖啡厅：Café，除了出售咖啡之外，还兼售红酒、点心等。

活动在“公共领域”中的具有公共关怀的“演员”和“观众”。本书采用桑内特具体化了的“公共领域”定义，引入其“公共人”概念，对晚清江浙地区的女性进行一个全新视角的研究。在晚清江浙地区，女子放足会、女校等“女子俱乐部”相继成立，除了公园、戏园，图书馆、演讲坛等也逐渐向女性开放，以往深居内闱的女性开始大规模进入“公共领域”。以往囿于私人领域、私人关怀的女性开始历史性地拥有公共关怀、公共意识，从而成为“公共人”。以往“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女性开始进入公共领域，或成为受人瞩目的“演员”，或成为专注观察的“观众”，她们的进步是划时代的。请看此前的女性社会地位：

恰恰是在大清国，一个普通的清国男人会告诉你：“女人绝对是最下贱的劣等动物！”而当你反问道：“她们不是也有精神和高贵的灵魂吗？”他就立即会发出“呸”、“呸”的轻蔑声。不过，当你对他说道：“整个大清国政府在过去18年中，除了偶尔的间断外，都是操纵在两个女人手里的，即皇帝的母亲慈禧皇太后以及慈安皇太后。这两个女人是大清国甚至是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在世的女人中最聪明的人。”听到这番话时，他会平静地回答：“她们也许和别人不同吧。”并且他仍丝毫不愿承认大清国的妇女可能也有智慧和理性。^①

作为占总人口大约一半的另一性别，女人一直都存在着。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女人只是关于“男耕女织”的描绘中模糊的影子，或者，是缕缕温情炊烟的默默守候者。她们“可能也有智慧和理性”？

从父系氏族社会起，女性就历史性地退出了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开始转向主要从事家内事务的操作。《尚书》中已有“牝鸡无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的铿锵话语。根据《尚书》的成书年代可以确知，汉代以前已开始对女性参与决策、管理的行为进行妖魔化描述，并严厉制止。可以说，自有信史

^① 1880年4月1日《纽约时报》中《新闻特写：清国皇亲国戚多达四万》，转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以来，女性就被限制于“由家人和朋友构成的、受到遮蔽的生活区域”^①，即私人领域，缺少表现其“智慧和理性”的舞台。因此，千百年来，中国信史大都是关于男性精英浩如烟海的记述，载入史册的女性寥寥可数。即便如此，相关的记载亦多是诸如某某之母某氏、某某之妻某烈妇之类，语焉不详。这就是中国古史中的女性，她们没有名字、身影模糊，只占据历史记忆的小小一隅。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社会使她成为了女人。”^②男权制社会中，男人掌握了政府权力及家族权力，以男性话语系统来规范社会、塑造女性；而女性则处于被规范、被塑造的地位，成为“第二性”。

江浙地区的门户——上海，在中国近代（以及此前）历史上的特殊性对近代女性的“公共人”化具有独特的影响。至少在嘉庆年间，上海凭着海运方面的强大优势就已经比较繁荣：“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③列强正是看中了包括上海在内的五个口岸在通商方面的重要意义，便通过鸦片战争提出开放通商口岸等要求。上海开埠后，以商人为主的外国人蜂拥进入上海，其中也有不少传教士。1848年，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在伯驾的资助下购买了一处房产，建立了新教上海传教站^④；紧接着便计划开办一所小教堂和一所学校。1850年，裨治文夫妇便成功地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女学——裨治文女学。而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原《教会新报》）则发表了一系列禁止缠足、禁溺女婴等文章，为中国女权的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传教士所创办的墨海书局（1843年）、广学会（1887年）等，除了出版基督教书籍，也在译介西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中国士子特别是上海及江浙士子产生了巨大影响。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王韬就曾供职于墨海书局。同时，上海由于租界的存在，清廷的严密统治难以为继。这也使其客观上成为新型精英分子的云集之地和众多进步刊物的创办之所。众多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则成为女性“公共人”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开埠后的上海，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

① [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② 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③ 嘉庆《上海县志》序。

④ [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262页。

变化，从而使其社会风气也日渐文明，开始走向近代化。《法华乡志》也曾提到：“上海自开埠通商以来，地方风气为之一变。”^①社会风气的开通，也是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女权、女学发展首善之区的重要因素。除了上海的影响，浙江地区也有着独立的特点，从而对女性“公共人化”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影响。在晚清，上海属于江苏；江、浙毗邻，上海对浙江的辐射力可想而知。但浙江自身的诸多特点也不可忽视：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宁波是其中之一；再者，鸦片战争后，英国随军牧师、普鲁士的新教教士、身兼英军翻译和情报官的郭士立担任了定海的“县令”，在殖民统治之余，也带来了一些近代的文明。譬如，郭士立强令地方绅董捐银建书院、育婴院、养济院、苦老院等。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陆最早的女校即出现于浙江宁波。所以说，江浙之地，风气开通居全国前列，成为清末女性“公共人”化发展最迅速、成果最显著之地：其时有数量较庞大的女性转化为“公共人”——具有了公共意识、公共关怀，同时也给江浙女界、江浙社会带来一系列破天荒的新变化，进而也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阶层力量对比、社会风气等，甚至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施加了一定影响。正因为如此，本书选择这一区域作为具体考察对象。

本书引入“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人”^②概念，以“社会性别”（gender）理论为指导，结合晚清时代的国际、国内背景，运用社会学理论，对晚清江浙地区女性的“公共人”化进行系统研究。发生在晚清的女性解放运动，使得千百年来基本生活在“私人领域”中的中国女性命运有了历史性改变——放弃缠足、保持天足，走出家门、走进学堂、走进社会，甚至走出国门，并且开始成为女性“公共人”，真正地融入社会。女性的公共人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大提高了社会的人力、智力、财力资源，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不仅发挥了女子才能，同时也促进了男子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公共人”概念对于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分类方法，使本书得以将研究的重心置于中国内闾之中女性的公共意识与公共关怀方面，包括其公共意识的产生——由个体人到公共人；以及其公共关怀的

① 《法华乡志》，（清）王钟撰，胡人凤续，沈宝昌序，民国十一年（1922年）铅印本。

② [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理查德·桑内特认为，当人格进入公共领域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两种公共人。少数人继续在公共场合主动地表达自己，即演员；另外一类公共人和前一类共生共长，这一类就是观众。

由弱到强——由“沉默的观众”到“热烈回应的观众”，进而成为积极参与的“演员”。在晚清中国，外国人每每痛斥中国人乏国家意识、少公德心等等。中国男子由于是天然的公共生活的参与者，其公共人化的进程较快，程度也较高；而中国困守内闱的女子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较少与公共生活产生联系，因此其向公共人转化的社会背景、原因及进程就足以成为一个课题。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女子，主要是中、上层的女子，她们有机会，或者说有条件接受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使她们有更多机会接触近代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的家资使她们有条件购买相关近代女子教育的书刊或接受近代女子学校教育。我们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然而总需要一些最早的振臂高呼、产生社会影响的人来开风气之先。本书的研究旨趣亦在于此。

直至当今社会，中国女性的公共人化进程还没有最终完成。许多规章、习惯和习俗，都对女性的公共人化形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阻力，男女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的局面还远没有形成。本书对于晚清女性公共人化的研究，便是希望重构历史，以资借鉴。

本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本书首先通过分析鸦片战争以来晚清中国的国势、国情，以及危机下的近代国家的若干嬗变——传教士的东来、近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崛起及其对女性公共人化的作用来阐述晚清江浙地区女性公共人化的时代大背景和若干条件。再者，通过晚清江浙女性报刊、白话报刊、其他影响较大的报刊及部分文人著作，解析晚清中央政府及江浙地方政府、新旧派绅士、近代公共知识分子及部分伪“志士”等对女性公共人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近代女子学校教育、反缠足等）的支持、骑墙及反动；剖析关于晚清女子解放的主要思想及论争，并着力对晚清女性公共人的中坚力量——“女史”作为一个具有自我认同与集体意识（共同意识）的群体的形成进行研究，以一些“女史”个案（很多都是闻名一时，却被淡忘甚至被遗忘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女性）为蓝本，对其群体自我评价的改变及提高、自身价值认同的建构及变迁进行论证。最后，综述由晚清江浙地区女性的公共人化所带来的社会整合——女子教育的发展、天足运动

的成果及女子社会地位（包括权利、角色等）的变化。

几个概念的界定

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gender）确是研究女性解放运动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概念，借助它我们可以更系统、全面地理解、分析女性解放的进程。

社会性别这一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被拉出以来，获得了快速发展与广泛传播，并向各个学科领域渗透。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新的观察分析的视角、工具，其最重要的特点与贡献在于，它将妇女和性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建构，不再孤立地看妇女，把妇女和性别关系看做是社会权力关系运作的表现与结果。这种关系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结构关系密切相关形成的等级，是需要改变并且能够改变的。^①所谓“社会性别”（gender），是相对于sex（“生理性别”或“生物性别”、“自然性别”）而提出的概念。生理性别是男人女人生理上的差异、身体构造的不同；而社会性别是指由社会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角色、活动及责任，是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

历史学家琼·斯科特认为：社会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②斯科特强调了两点：第一，社会性别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第二，社会性别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存在方式。正如人类学家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所说：“妇女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仅是妇女功绩的产物，而且是在社会互动中妇女所发挥的作用的产物。”^③

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共人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一词，由美国历史学家罗素·雅

① 杜芳琴：《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 [美]琼·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的范畴》，转引自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精选》，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③ 同上。

各比^①于其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中首先提出，定义为把普通的或有教养的人当作听众的知识分子。美国法学家理查德·A. 波斯纳在其著作《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剖析和论证，从而使其更加生动饱满。波斯纳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他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以社会公众可接近的方式表达自己，并且其表达聚焦于有关或涉及政治或意识形态色调的社会公众关注之问题”。^②此外，公共知识分子还拥有一些优秀品质：“视角、气质、品格和知识”。^③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虽由罗素·雅各比在1987年首先提出，然终于2001年因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而引发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约在2002年，随着该书译版的出版及国际学术交流的促进，“公共知识分子”为国内学者所接受和采纳，并用于对当前社会事件、问题之探讨。

“公共人”的概念，由理查德·桑内特在其专著《公共人的衰落》^④中提出，“公共”意味着一种在亲朋好友的生活之外度过的生活，区别于此前基本处于一个“由家人和朋友构成的、受到遮蔽的生活区域”——私人领域，几乎没有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的非公共人。理查德·桑内特认为，当人格进入公共领域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两种公共人。少数人继续在公共场合主动地表达自己，延续了古代政制时期的想象，即认为凡人皆是演员；另外一类公共人和前一类共生共长，这一类就是观众。

① 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也译作拉塞尔·雅各比、罗素·雅柯比。1945年出生于纽约，先后在芝加哥大学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求学，1974年在罗彻斯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为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历史学教授。研究领域为20世纪欧洲及美国的文化史，特别着重教育及知识分子的领域。他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而引发了学界长达数十年的讨论。另著有《乌托邦的终结》、《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等。

② [美]理查德·A. 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③ [美]理查德·A. 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④ [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社会整合

帕森斯在《社会体系和行动理论的演进》（1977年）一书中，把社会整合概念规定为：社会体系内各部门的和谐关系，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避免变迁；体系内已有成分的维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一个社会要达到整合的目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有足够的社会成员作为社会行动者受到适当的鼓励并按其角色体系而行动；其次，使社会行动控制在基本秩序的维持之内，避免对社会成员作过分的要求，以免形成离异或冲突的文化模式。^①继帕森斯之后，社会学家对社会整合概念的解释及运用逐渐分化为两种倾向：一种沿袭帕森斯的观点，继续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理论体系中，从抽象的意义上予以解释和运用，另一种则朝着经验研究的方向，将这一概念用来研究各种社会群体内、群体之间的实际关系，特别是用来研究民族及种族群体的关系，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文化上的接近、融合等。社会整合有多种具体形式，并可分为诸多类型，包括社会体系的整合、民族或种族关系方面的整合，以及文化的整合、制度的整合、规范的整合、功能的整合等。

^① 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页。

第一章 “公共领域”的两股新兴力量

在大不列颠乃至整个欧洲大陆，新的曙光就要来临。……各传教差会纷纷制订行动计划，并派遣传教士到各个非基督教国家去，以实现将福音遍传天下的愿望。新教传教士甚至没有忽略亚洲、非洲和南太平洋诸岛。在一部分人眼里，十二门徒之后最伟大的时代来临了。

——奥利弗·埃尔斯布里：《美国传教精神的兴起》^①

1840年以降，晚清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史写下了一系列晦暗、屈辱的篇章。西方侵略者带着血腥残暴的坚船利炮和温情脉脉的上帝福音，趾高气扬地踏上了中国这片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沃土。在被迫进入西方世界主导的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中国首先遭到的是侵占与掠夺。赔款割地，国权日削，国事日坏。危局之下，自下而上发生的反思与抗争便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晚清公共领域两股重要的新兴力量——传教士和近代公共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近代女性权利的扩张，也从此开始。

西来的传教士为了传教需要，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诸如开办学校、反对缠足、溺婴等公益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女权的扩张；而在国家危难之际愤然崛起的晚清公共知识分子为了救国之需，也积极倡导女权。这两个因素，成为晚清江浙地区女性公共人化之新机。

^① 参见[美]奥利弗·埃尔斯布里《美国传教精神的兴起》，宾夕法尼亚州威廉斯波特出版公司1928年版，第47页。转引自[美]雷孜智（Michael C.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第一节 传教士与晚清女性公共人化

早在18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由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引领的“新神启派”（New Lights）之巡游布道活动拉开了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不久就遭到了清教团体中的保守势力“旧神启派”（Old Lights）的攻击，同时也被很多宗教“自由派”（Liberals）反对。前者认为这场运动严重地威胁了宗教正统性，后者则批评它鲁莽地背叛了欧洲启蒙精神中的人文主义原则。公理会牧师、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Johathan Edwards, 1703—1758）把宗教复兴主义的虔诚、热忱和正统加尔文陈腐的教条巧妙地结合起来，对“新神启派”的神学观点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和雄辩的说理。爱德华兹一方面反省“新神启派”在指责对手“未受神启”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优越感”，另一方面试图论证大觉醒运动的兴起是振兴而非削减了加尔文派的宗教思想。对于“自由派”的责难，爱德华兹首先避其锋芒，指出“新神启派”无意贬低人类理性的价值与力量；接着强调了脱离《圣经》的神启与宗教体验，任何形式的知识本身都无力改造人的本性。可以说，爱德华兹对“新神启派”观点相对稳健周密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将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推向了前进。

充满了争论与辩难的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成果：“在大觉醒运动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人们不再局限于探求救赎问题——他们不仅要做主的荣耀的接受者，还要努力做它的传播者。”^①

18世纪末叶，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爱德华兹最有名的学生，阐释和发挥了后者关于基督在千禧年重临的预言：

千禧年必然带来理性与知识的高度发展，人们届时将能更好地认识上帝所启示的伟大真理和信条，认识到那些真理和信条之间的联系、它们的完美和重要之处。它们必将被所有的人认识及信奉。人们将在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认识之下联合起来，将世界共同构建成一个幸福、友爱的基督徒

^① 高斯塔德：《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转引自[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大联盟，人们彼此真心相爱、坦诚相待。^①

简言之，霍普金斯的《论千禧年》就是基督徒版的乌托邦。霍普金斯的思想直接引发了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使美洲大陆的福音派基督徒们充满了传教的热情。与此同时，在“对世界局势的担忧和神学冲动的刺激下”^②，欧洲新成立的传教差会也热衷于海外传教。因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及欧洲国家掀起了向海外（包括中国）输送传教士的热潮。

传教士来华的“主业”即是传播福音，为上帝招募信奉者。但是，文化的传播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需要经过渐进的浸润、渗透，从而逐渐被传播对象有选择地消化和吸收。突然地、人为地从外部植入异质文化，效果必然难以令人满意——作为与社会文化、心理、习俗密切相关的宗教文化，则尤其如是。

来华传教士面临着上述困境。为了传教工作的开展，传教士们出版教会报刊，开办教会学校、医院，通过这些“贰业”来接近中国人，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然而，有的传教差会是反对传教士热衷于此的，主张传教士要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进行“朴实的福音传播”。

一 尴尬的“主业”：以使命对抗传统

为了把基督的福音传给至少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异教徒”，传教士们需要克服重重的困难，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还要面对惨淡的传教成果。

1. 语言障碍

要面向中国人传教，来自大洋彼岸的传教士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但是，18世纪以前的西方人对于中文几乎一无所知。譬如，18世纪初的英国，懂中文的本国公民只有一个叫史当东的人，并且此人并不住在英国；英国仅有的一部不完整的中文版《新约全书》，据说是由巴黎天主教的传教士巴设翻译的。所以，英国“伦敦传教会”^③派遣来华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当时得到的指令是：编纂一部更加适用的中文字典；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以使占世

① 参见[美]塞缪尔·霍普金斯《论千禧年》，纽约阿尔诺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② [美]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③ 伦敦传教会成立于1795年，由在英国的公理会、圣公会、长老会和循道会四个基督教新教宗派联合组成，其宗旨是向海外非基督教徒传播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后兴起的“新教”。